

傳教士 James Gilmour

及其筆名、中文姓名研究

特木勒* 罕欣**

近代西方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不僅活躍於中國的沿海和內地，他們的足跡更是行遍中國的內陸邊疆地區，內蒙古地區就是他們傳教的重要區域之一。從19世紀後期開始，內蒙古地區就有大批來自歐美國家的新教傳教士。他們受各自差會的派遣，來到蒙古地區，開展傳教工作，所涉及教會數量之多，人數之眾，遊歷之廣，內容之豐富，絕不遜於沿海和內地任何區域。但是，比較其它區域，內蒙古地區又有其特殊性，對於基督教傳教士來講，內蒙古地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他們的傳教事業遇到很多未曾逆料的困難。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前期的內蒙古，大部分蒙古人還保持着“逐水草而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這與傳教士們曾經熟悉和適應的內地定居農耕區的文化環境迥然不同。在這種條件下，很多傳教士採取了巡遊傳教的工作方式。然而，對於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構成嚴重障礙的非僅遊牧文化，更重要的是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也就是黃教，俗稱喇嘛教。藏傳佛教格魯派自16世紀末期傳入蒙古社會以後，迅速傳播開來，入清以後又得到清朝統治集團的利用和扶持，與蒙古政治勢力相結合，給予蒙古社會的方方面面以深重的影響。藏傳佛教猶如堅冰鐵壁，篤信藏傳佛教的蒙古人不能理解傳教士們所傳達的信息，傳教士們在蒙古地區的傳教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挫折。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或知難而退，或轉移目標，將注意力轉向移民口外的漢人群體。能夠忠於職守，長期堅持在蒙古人中傳教的新教傳教士寥若晨星。本文所要討論的 James Gilmour 正是這樣一顆“晨星”，他是一位長期矢志不渝地在蒙古地區的蒙古人中傳教的傳教士。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研究，西方學界起步較早。1892年，倫敦會的羅里查（Richard Lovett）編輯出版了史料長編式的傳記《蒙古的 James Gilmour：他的日記、信件和報告》。⁽¹⁾ 1924年，耐爾聶（W. P. Nairne）撰寫出版了第一部 Gilmour 的傳記《蒙古人的 Gilmour》。⁽²⁾ 布萊森夫人（Mrs. Bryson）的《James Gilmour 的故事和蒙古教務》是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傳記。⁽³⁾ 20世紀賴德烈、文顯理和戈爾曼等學者和傳教士的著作都提到了此人。日本學者衛藤利夫、前島重男和後藤富男等也在20世紀前期開始注意 James Gilmour 並翻譯了他的著作。有關 James Gilmour 的專題論文的出現是近幾年才有的事情，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凱瑟琳教授近年來廣泛利用《教務雜誌》的史料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收藏的大量倫敦會原始檔案，就 James Gilmour 及其在蒙古傳教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取得了重要突破。⁽⁴⁾ 值得注意的是，在 James Gilmour 長期生活和傳教的中國，有關 James Gilmour 的研究卻一片沉寂，迄今仍處於空白狀態。筆者根據讀書心得，在介紹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對 James Gilmour 的相關問題作初步探討，試圖在 James Gilmour 研究方面做一些中國學者所能做的初步的工作。

* 特木勒（1972-），內蒙古扎賚特旗人，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講師，歷史學博士，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中心研究員（Kluge Fellow, 2004-2005）。

** 罕欣（1976-），江蘇南通人，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James Gilmour 生平及著述

James Gilmour 是蘇格蘭人，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 LMS）傳教士。1843 年，他出生於蘇格蘭哥拉斯各（Glasgow）的小鎮凱特金（Cathkin）。1862 年進入哥拉斯各大學。在大學畢業以後，他報名參加了倫敦會。倫敦會派他進入徹順學院（Cheshunt College）接受專業訓練。1870 年，他在愛丁堡被委任為牧師，同年受倫敦會派遣前往蒙古地區。從此以後，Gilmour 在內外蒙古地區巡遊傳教長達二十年有餘。

倫敦會傳教士從 1817 年開始在布里亞特蒙古人中開展傳教工作，他們“在布里亞特蒙古族人中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 1843 年俄國政府命令他們停止工作。”⁽⁵⁾該會將 James Gilmour 派到蒙古的初衷就是要恢復他們在布里亞特蒙古中輟的傳教事業。Gilmour 於 1870 年 5 月到達北京，同年 9 月即抵達恰克圖，“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裡的俄國人和蒙古人都不希望他留在當地”⁽⁶⁾，他的工作重心遂轉移到內蒙古。此後的十五年中，Gilmour 通常是在夏季從北京出發，經張家口到內蒙古西部盟旗巡遊傳教，冬季則一般活動於北京的裡館和外館，在進京的蒙古人中傳教。從 1886 年開始，Gilmour 轉移到東蒙古地區，在朝陽、大城子和大吉口等地傳教，直到 1891 年 5 月 21 日病逝於天津。賴德烈（K. S. Latourette）教授在他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史》中說：“他於 1870 年來（華），面對冷漠、誤解、懷疑、稀缺的信徒以及部分信徒的背信棄義，繼續他的工作，直到 1891 去世為止。”⁽⁷⁾文顯理（G. H. Bondfield）博士說：“James Gilmour 對蒙古人的熱愛以及為勸化他們而單獨進行的努力將永遠不會被忘記。”⁽⁸⁾前島重男說：“他是倫敦傳教協會的成員，蘇格蘭出身的詹姆斯·吉爾瑪，他是立志於蒙古傳教而進入蒙古地區的傳教士。他在蒙古地區的記錄以《蒙古人之友》為書名（*Among the Mongols*，後藤富男日譯）由該國宗教文獻協會出版。書中詳盡敘述了他自 1870 年二十六歲開始，從北京出發深入蒙古地區旅行，直到 1891 年死於天津為止，在蒙

古地區所遇到的種種事情。祇是在這一旅行中，他在尚未開化的蒙民中沒能留下預期的傳教效果。然而他作為一名傳教士，單人跋涉蒙古草原，這對本文來講，是難於忽略的事實。”⁽⁹⁾應該說，James Gilmour 是 19 世紀後期蒙古地區最著名的新教傳教士之一，也是倫敦會最著名的傳教士之一。

19 世紀後期和 20 世紀前期蒙古地區的西方傳教士不勝枚舉，蒙古學學者熟知的拉爾森（F. A. Larson）⁽¹⁰⁾、羅伯特（James Robert）⁽¹¹⁾、赫德利（John Hedley）⁽¹²⁾以及內地會三婦女傳教士⁽¹³⁾都曾到蒙古地區，也都留下了關於蒙古地區見聞的著述。但是他們並沒有長期堅持傳教工作，祇是從事遊歷和考察，與其說他們是傳教士，還不如說是旅行家。想比之下，James Gilmour 堅守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始終如一，在蒙古人當中傳教，成為一名純粹的傳教士。賴氏和文氏從中國基督教史的角度，僅就 Gilmour 的傳教工作從總體上給予概略的評價，限於體裁，沒有作更多的描述。凱瑟琳（Kathleen Lodwick）教授的論文《為了上帝和女王：James Gilmour 1870-1891 年在蒙古》為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信息。Gilmour 在蒙古地區傳教的二十年幾乎是孤軍奮戰，在二十年的時間裡不僅沒有爭取到一名蒙古信徒，其間他的妻子不幸病逝於北京，兩個學齡孩子錯過上學的時間。除此之外，Gilmour 的傳教工作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篤信藏傳佛教的蒙古人不能理解 Gilmour 為甚麼會不遠千里到草原深處宣講福音，對於他宣講的福音也難於接受，卻對於 Gilmour 的行醫施藥非常歡迎。行醫傳教為 Gilmour 接近蒙古牧民、在他們中間巡迴傳教提供了很多有利條件，但是也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倫敦會在北京的一家醫院進行過一例眼科手術，患者似乎是由 Gilmour 推薦進京就醫的。由於手術失敗，患者失明，內蒙古草原遂謠言四起，盛傳 Gilmour 等外國人挖人眼球，取人眼珠裡的水沖洗相片云云，在 Gilmour 傳教的內蒙古草原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這使得 Gilmour 的傳教工作更加舉步維艱。他說：“繼續在蒙古草原傳教猶如在火藥庫中秉燭前行。”更棘手的矛盾來自教會內

部，倫敦會的同工 Edkin 和 Dudgeon 兩人鑒於 Gilmour 未能在蒙古人中爭取到信徒，主張放棄蒙古地區，而倫敦會總部遲遲不給予明確的指示。Gilmour 本人雖然屢遭挫折，仍然堅持在蒙古人中傳教，且對 Edkin 等人的批評給予激烈的反駁，甚至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¹⁴⁾凱瑟琳教授的研究使我們對有關 James Gilmour 的問題有了比較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豐富了我們關於 Gilmour 的知識，也使得賴氏和文氏對他的評價顯得鮮活而生動。

前蘇聯學者戈爾曼在他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中說：“英國傳教士詹姆士吉爾摩（葛雅各）在蒙古主要是內蒙古度過了二十多年——從 1870 年到他去世的 1891 年。他寫過三本書：《在蒙古人中》、《蒙古探險記》和《再談蒙古人》。如果說前兩本書主要是以民族學方面的記載而令人感興趣的話，那麼第三部書作為 1870 年從張家口到恰克圖再返回張家口的遊記，則以對當時的喀爾喀蒙古作了生動描述而令人感興趣。”⁽¹⁵⁾以 James Gilmour 署名出版的書誠如戈爾曼所說的有三部，但是需要澄清幾個問題，上述三部書中唯有《在蒙古人中》（*Among the Mongols*）是 Gilmour 生前出版的；《再談蒙古人》（*More about the Mongols*）是在 Gilmour 去世之後由倫敦會選取他在 1884 年以後發表的文章和遺稿編輯而成的，內容都是《在蒙古人中》中沒有出現過的；《蒙古探險記》（*Adventures in Mongolia*）則是在 Gilmour 去世後由其同工從《在蒙古人中》選取十六章編輯而成，《蒙古探險記》可以說是《在蒙古人中》的刪節本。三部書中最著名的是《在蒙古人中》。1883 年，James Gilmour 在回英國休假期間出版了他的大作《在蒙古人中》⁽¹⁶⁾，書中描述了內外蒙古的自然和人文的各個方面。該書出版以後在英國引起極大的轟動，有人甚至將此書比作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所不同的是，Gilmour 書中所描寫的是真實的經歷。雖然“作為一名傳教士，Gilmour 在個體上是不成功的，但是他是一名熱情的作家，這本書在 1883 年第一次對於他的旅行和 19 世紀末的蒙古人，特別是普通蒙古人的生活和習俗作了經典的旅行見聞式的描述。”⁽¹⁷⁾凱瑟琳教授

說：“其他很多爭取到數百名信徒的傳教士早已經被人們遺忘了，而 James Gilmour，作為傳教士未能勸化一個蒙古人，卻因為撰寫《在蒙古人中》生動地記錄了 19 世紀後期的蒙古生活。這本書在英國出版之後被譯為日文。在 Gilmour 首次到達蒙古的整整一個世紀之後，其英文本又重新出版。”“傳教士 James Gilmour 變成了人類學家 James Gilmour。”⁽¹⁸⁾如果我們從蒙古學的角度進行觀察，應該肯定，他是英國最早的蒙古學家之一。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筆名和中文姓名

James Gilmour 是一位勤於筆耕的傳教士，在二十年的傳教生涯中，他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發表了大量文章。Gilmour 於 1870 年到達中國，從 1872 年元月開始，到 1883 年回國休假為止，以 Hoinos 為筆名在《教務雜誌》連續發表大量文章，介紹蒙古文化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章也構成了 Gilmour 回國休假時出版的《在蒙古人中》（*Among the Mongols*）的主體部分。根據凱瑟琳教授的教示，Hoinos 就是 James Gilmour 的筆名。經過分析，我們認為，Hoinos 是蒙古語 Hoina ača 的母音後同化的結果。根據有三：首先，Hoina 意謂“北方”，ača 是蒙古語的從格助詞，口語中被 Hoina 的 o 母音同化而讀成 Hoinos（意謂“來自北方”或“來自後方”），這種現象在蒙古語口語中極為普遍；第二，Gilmour 到中國以後，先後在恰克圖、北京、張家口和內蒙古學習語言，掌握了較熟練的蒙古語。身為蒙古地區的傳教士，且通曉蒙古語，Gilmour 用蒙古語筆名發表關於蒙古文化的文章是理所當然的；第三，《教務雜誌》於 1867 年始創於福州，1874 年在上海復刊，此後一直到 1941 年停刊為止，編輯部一直設於上海。Gilmour 的投稿則來自塞北蒙古地區，他取“來自北方”或“來自後方”的 Hoinos 這樣一個表示來稿地理方向的蒙古語詞作為筆名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們認為 Gilmour 的筆名 Hoinos 應該是蒙古語名。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國內外學界長期存在誤解，這一誤解的根源應該是《中華歸主

——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年漢譯本。該書《內外蒙古》一節說：“倫敦會最抱佈道熱忱之葛雅各君 (James Gilmour) 始創遊行佈道工作，遠至本區恰克圖等處，道途跋涉，莫遑安處，垂二十餘年。惟最先之十五年，葛氏僅於本區北部游牧蒙人中專任佈道工作，且逆料東南部蒙人農民中之事業可由華佈道員擔負責任，迄1886年，始獲常駐於本區東部；然尤勤奮不倦，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為吾道中之佼佼者。”⁽¹⁷⁾ 這是迄今筆者所見最早使用“葛雅各”的有關 James Gilmour 的漢文文獻。

《中華歸主》是一部重要的中國基督教史文獻。該書英文本出版於1922年。同年，由全紹武主持翻譯的中文本亦得付梓。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組織人員根據英文本重新全面漢譯，並在1985-1987年陸續出版⁽²⁰⁾，這就是目前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所引用的通行譯本。新漢譯本出於慎重起見，對舊譯本傳教士的中文姓名未作任何改動。⁽²¹⁾ 這樣，“葛雅各”照舊出現在《中華歸主》新漢譯本中。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葛雅各”影響深遠，戈爾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漢譯本在談到 Gilmour 的時候說：“英國傳教士詹姆士·吉爾摩 (葛雅各) 在蒙古主要是內蒙古度過了二十多年——從1870年到他去世的1891年。”⁽²²⁾ “詹姆士·吉爾摩”應該是來自《英語姓名譯名手冊》⁽²³⁾。而括弧裡的“葛雅各”想必是來自《中華歸主》的漢譯本。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歐美日本學界對於 Gilmour 的知識遠比中國學者全面而系統，但是 Gilmour 的中文姓名仍然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問題。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點睛論壇》網站也將 James Gilmour 的漢名寫作“葛雅各”⁽²⁴⁾，這明顯是取材於《中華歸主》的新或舊漢譯本。

我們認為，準確理解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對於 James Gilmour 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僅因為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是有關他的個人信息的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它關係到相關漢文史料，特別是漢文檔案的發掘和利用。

James 就是 Jacob，本來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的名字。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名字中的 James 通常漢譯為雅各 (Jacob)。倫敦會的另一位傳教士，與 Gilmour 同鄉的理雅格 (James Legge)、內地會的傳教士韋雅各 (James Williamson) 等都是例證。James Gilmour 的名字譯為雅各當然無可厚非。我們的問題是，Gilmour 的漢姓是否葛？我們對這一問題最初的懷疑來自布萊森夫人 (Mrs. Bryson) 所撰《James Gilmour 的故事和蒙古教務》所提供的一條線索。該書中談到，在 James Gilmour 1891 年在天津逝世的時候，他的信徒悲痛地呼喚：“Ching Mu-sz, Ching Mu-sz!”⁽²⁵⁾ 這一稱呼出自追隨他的信徒的口。Mu-sz 當然就是“牧師”，而與 Ching 相對應的應該是 James Gilmour 的漢姓，但是究竟是哪個漢姓，布萊森夫人未作解釋。1891年，Gilmour 因傷寒病在天津辭世，《教務雜誌》1892年11月號的《文選》節選發表倫敦會密教士 (S. E. Meech) 的一封信的部分內容，名為“Gilmour 先生如何忍受侮辱”，該文談到，“幾天前，我們的一位經常在禮拜堂幫助傳教的信徒遇到一位熟人並把他帶到了禮拜堂。這位來訪者問及 Gilmour 先生，當聽說 Gilmour 已經去世的消息，來訪者不禁為之動容。當被問及他如何認識 Gilmour 先生的時候——

他 (來訪者) 談到，幾年前他因為做生意到蒙古。有一天，他在大城子 (Ta Che'eng tsz) 一家飯館的時候，一個外國人也走進來坐下。這時候有一個人進來辱罵他，叫他“洋鬼子”，指責他偷人的心臟和眼睛。儘管此人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對待他，Gilmour 先生並沒有理會。店主卻認為應介入此事並威脅要打此人。當店主威脅要趕走他的時候，Gilmour 上前勸阻店主。店主說：“他可是這三天來一直在罵你。” Gilmour 說：“他在罵鬼，而我不是鬼，我是 Ching Ya ko (他的中文名字)。他在罵那些偷人心臟和眼睛的人，而我從來沒有做過那些事情，所以他一定是在罵別的甚麼人。” Gilmour 的態度和脾氣震驚了在場的聽眾，給了他們極深的印象。禮拜堂的這

個來訪者說，從那時起他開始相信，宗教一定有甚麼東西能夠引導人以這種方式忍受侮辱。(26)

密教士在文章中用括弧特別注明 Ching Ya Ko 是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根據“來訪者”的描述，這 Ching Ya Ko 是 Gilmour 的自稱。Ya Ko 當然是雅各，與 Ching 對應的漢姓究竟是甚麼？看來，James Gilmour 與很多來華傳教士一樣的確有中文姓名，但不是“葛雅各”。那麼，他的中文姓氏究竟是甚麼？我們在查閱臺北出版的《教務教案檔》時，終於找到了答案。西方國家傳教士離京到地方傳教時，須經該國或在中國擁有保教權的國家公使致函清朝總理衙門申辦簽證，由總理衙門“割行”順天府辦理，護照由後者蓋印以後交回總理衙門，再由總理衙門轉交該外國公使館。英國傳教士 James Gilmour 經張家口到蒙古傳教，須經英國公使致函總理衙門辦理簽證，在辦理簽證過程中產生的文書有幸在《教務教案檔》中保留下來，為我們考訂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提供了重要依據，現徵引如下：

（光緒十一年，1885）十一月初一日，給英國公使歐格訥函稱：准函稱本國教士景雅各擬往張家口內外一帶遊歷，繕就護照，請轉飭蓋印送還等因，本衙門現將護照割行順天府蓋印訖，即壽貴大臣查將景教士可也。此頌日祉！（27）

英國公使歐格訥就是 Nicholas O'Connor，這裡的景雅各就是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在大城子的飯館裡他自稱的 Ching Ya ko，就是景雅各；在他去世時信徒呼喚的 Ching Mu-ts 就是“景牧師”。用 Ching 來表示“景”的讀音是威妥瑪系統的拼音法。上引史料並非孤證，在《教務教案檔》中我們還發現：

（光緒十四年，1888）二月二十四日，英國公使華爾身函稱：頃聞本國教士景雅各在承德府建昌、朝陽等縣地方傳教，誠恐該處民間向習教人勒派迎神、演劇、賽會、燒香各費，或致滋生事端之說，本大臣查此等冗費曾奉諭旨恩准教民

免捐，履行通行有案，惟恐以上各處民人於朝廷如何相待教民或有未悉，否則該教士自無可慮之處。為此函請貴署惠飭地方，早日出示賜予教士教民之德意，剴切申明，似此未雨綢繆，庶免意外之虞。(28)

1886，景雅各轉到大吉口，大城子和朝陽一帶進行傳教活動，1890年由朝陽回到天津養病。從這條材料也可以看出景雅各在建昌、朝陽等地傳教的情形。

1891年熱河一帶發生金丹道事件，接替景雅各的傳教士巴約翰(John Parker)取道錦州返回天津避難。在此期間，巴約翰與北京的傳教站一度失去聯絡。英國公使應密教士(S. E. Meech)的請求，照會總理衙門，希望幫助查找巴約翰的下落，總理衙門通過北洋大臣進行調查。朝陽地方官得到資訊，巴約翰在朝陽縣的住處是朝陽縣城南街的錢家客店，於是傳訊了該店的留守夥計錢中興。朝陽知縣廖倫明根據錢中興的口述撰寫報告說：

據供稱：“伊在錢文煜開的客店內幫夥，光緒十三年間有洋人井姓到伊店內存住。去年春間，他赴天津去了。至今年春間，又有一個洋人來到伊店內存住，約三十多歲，不知他何姓名，言說姓井洋人病故，他來替，舍藥並不要錢。還有一個使人姓劉，伊亦並不知他何姓名。至十月十三日早晨賊人進城，他二人赴錦州去了，臨行言說朝陽太平還回來、若不太平即由錦州往天津去的話，以後伊不知道。”(29)

錢中興口供中引述的巴約翰(John Parker)所言“井姓洋人病故”，說的就是景雅各(James Gilmour)在天津病故事，此事發生在1891年5月21日。

Gilmour之所以選用漢姓“景”，用漢名“景雅各”可能與唐元時代的景教——最早在中國傳播的基督教有關；祇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景仰雅各”。當然，這些都祇是推測。但是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是景雅各，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我們在相關的原始史料中從未發現“葛雅各”的用法，“上帝

的還給上帝，愷撒的還給愷撒。”——漢文文獻中所有與傳教士 James Gilmour 相對應的“葛雅各”的文字都應該改作景雅各。本文前述布萊森夫人 (Mrs. Bryson) 所撰書名也應該漢譯為《景雅各的故事和蒙古教務》；羅里查的書名應該譯為《蒙古的景雅各——他的日記、信件和報告》；耐爾聶的書名應該譯為《蒙古人的景雅各》。

【註】

- (1) *James Gilmour of Mongolia, His Diary, Letteres and Reports*, Richard Lovett,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92.
- (2) *Gilmour of the Mongols*, W. P. Nairn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mt., 1924.
- (3) Mrs. Bryson, *The Story of James Gilmour and the Mongol Mission*, London: The Sunday School Union.
- (4) Kathleen L. Lodwick, "For God and Queen: James Gilmour in Mongolia, 1870-1891", Kathleen L. Lodwick and Wah Cheng, ed., *The Missionary Kaleidoscope: Six Portraits of China Missionaries*, Westport, Connecticut: Eastbridge, 2004.
- (5)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中)頁539。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1986年。
- (6) 全註(4)上揭書，p. 365.
- (7)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365, Ch'eng Wen Publishing House, Taipei, 1975. (賴德烈《中國基督教會史》，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
- (8) G. H. Bondfield, *Mission Work in Mongolia*, *Chinese Recorder* 1912, August. p. 155. (文顯理《蒙古教務》，載於《教務雜誌》1912年8月號頁155。)
- (9) 前島重男《基督教在內蒙古——以厚和為中心的概況》，《內陸亞洲》第一輯，頁118，生活社，1941年。本文所引文字引自斯林格漢譯文，載於《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二輯，頁217，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後文中將談到 Gilmour 《在蒙古人中》出版於1883年。所以該書描述的祇能是1870年到1883年之間的經歷，前島重男的敘述有不確之處。
- (10) 拉爾森 (F. A. Larson) 是瑞典傳教士，後來為美國一教會工作。他的著作有《拉爾森，蒙古公爵》(*Larson, Duke of Mongol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
- (11) James Robert, *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 Boston: Pilgrim Press, 1903.
- (12) John Hedley, *On Tramp Among the Mongol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0.
- (13) 三婦女傳教士是內地會傳教士蓋群英 (Mildred Cable)、馮貴石 (Evangeline French) 和馮貴殊 (Francesca French)。她們在去新疆傳教途中曾經造訪內蒙古阿拉善盟。她們的著作有著名的《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42)。三婦女傳教士的中文姓名是由新疆社會科學院的木拉提·黑那亞提博士根據中文檔案考訂出的。參見其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近現代新疆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研究》頁41，2001年5月未刊本。
- (14) 全註(4)上揭書，p. 80.
- (15) (22) 戈爾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陳弘法漢譯本，漢譯，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57。
- (16) James Gilmour, *Among the Mongols*,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3. 日本學者後藤富男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將此書譯為日文，書名譯為《蒙古人之友》(1939年)；大概是鑒於後藤譯本的不足，佐藤武久重新翻譯此書，於2002年2月出版了新日譯本。蒙古國立大學的巴圖夫根據佐藤新日譯本蒙譯為基里爾蒙古文。筆者尚未見該書新舊日譯本及基里爾蒙古文譯本。
- (17) Judith, Nordby, *Mongolia*: p. 9, (World Bibliographical Series, Volume 156) CLIO Press, 1993. (朱蒂斯·挪德比《蒙古》，世界文獻叢書第156輯。)
- (18) 全註(4)上揭書，p. 87.
- (19)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之第四編〈特別行政區與無工作地面〉第九頁。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1922年。
- (20)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中華續行委員會編，蔡詠春、文庸、段琦等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21) 承蒙新譯本的譯者之——文庸先生教示，譯者在參照舊譯本，全面翻譯《中華歸主》英文本的時候，採取了非常嚴謹的態度，對傳教士的人名的翻譯未做改動。這一點在我們對照新舊譯本的時候得到了印證。
- (23) 新華通訊社譯名資料組編，商務印書館，1989年。
- (24) <http://ricci.rt.usfca.edu/biography/view.aspx?biographyID=72>
- (25) Mrs. Bryson, *The Story of James Gilmour and the Mongol Mission*, p. 140, London: The Sunday School Union.
- (26)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892. p. 512. S. E. Meech 在《教務教案檔》中被稱為密教士，他是 Gilmour 的聯襟。這條材料是根據《教務雜誌引得》(*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841*, compiled by Kathleen Lodwick,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6) 發現的。
- (27) 《教務教案檔》第四輯(一)頁25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 (28) (29) 《教務教案檔》第五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頁331；頁373-374。

【鳴謝】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文庸先生是《中華歸主》新漢譯本的譯者之一。2004年3月，當筆者打電話給文先生，請教關於《中華歸主》舊漢譯本情況時，他熱情地代筆者聯繫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圖書館，希望能幫助我讀到該館所藏舊漢譯本。但是後來文先生被告知，該所圖書已經合併到中國社科院大館，尚在編目，不便閱覽。這樣，筆者原來計劃的北京之行祇能取消。4月，筆者有幸承蒙丁光訓主教的引薦，奔赴上海，在基督教全國“兩會”得到陳美麟女士和田文載先生的熱情幫助，終於在圓明園路169號拜讀了“兩會”圖書館所藏《中華歸主》的英文本和1922年漢譯本。在本文撰寫過程中，還得到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的希都日古博士及其夫人敖文格日勒女士，日本明治大學的櫻井志美博士和在北海道室蘭理工大学留學的同窗李達喜等諸位女士和先生的熱情支持和幫助，在此謹向上述各位一併致以最誠摯的謝忱！（特木勒）